

合理性的询问

理性视野中的中西哲学与文化

「方同义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合理性的询问

——理性视野中的中西哲学与文化

方同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合理性的询问 / 方同义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6

ISBN 7-5043-3329-8

I .合… II .方… III .哲学 - 研究 - 中国 IV.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5036 号

合理性的询问

——理性视野中的中西哲学与文化

作 者:	方 同 义
责任编辑:	高 骏
装帧设计:	张 森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上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 字
印 张:	12 125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7-5043-3329-8/B 88
定 价:	21.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我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方同义同志的，此后曾有书信往还，或偶得一见。我比他虚长二十岁，可谓忘年之交。他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其对南宋浙东学派有过专深的研究，九十年代初在这方面发表多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方同义同志不仅于中国哲学有厚实的功力而且也十分关注中西哲学异同比较的研究，为此他潜心地进行长期思考和不断地探索，终于写出了近三十万言的富有特色的学术专著——《合理性的询问：理性视野中的中西哲学与文化》。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是近代以来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讨论和求索的重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历经五千余载而常变常新，但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却受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凌又从逆境和沉沦中奋发自强，初步实现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认识、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价值？哪些内容对于中华民族走向未来以及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哪些又是中华民族在前进过程中必须加以摒弃的东西？哪些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能重现其价值？哪些又是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不相吻合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要从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深入研究分析中得来，而且必须要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比较考察中，才能明白地显现出来。因此，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不只是如何深入分析中华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独特性，也是中华民族如

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实现民族振兴的重大实践问题。如此，其受到近代以来的诸多学问大家、一般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作者针对以上问题作了全面的审视和多层次的剖析，统观全书内容及系统脉络，乃自成一家之言。

一是，内容的探索性。中西哲学文化比较是个老问题，容易造成泛泛而论。但本书的许多内容却具有探索性和开拓性。例如，以何为标准作为评价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基本尺度？“全盘西化论”以西学为评价尺度，实质是彻底否定中国本土文化；“国粹论”则全盘肯定传统，是以传统文化自身为评价尺度；……如此等等。本书作者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的“实践合理性”，作为评价中西哲学文化的尺度，其观点鲜明、颇有自己的见地。作者对“实践合理性”的价值课题和系统结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阐述，从理论普遍性、操作有效性、实践目的合理性各个方面论述了“实践合理性”的内容。又如，如何界定中西哲学的理性精神？作者提出古希腊哲学的“理”和先秦哲学的“道”体现了两大哲学系统的理性精神的内在本质，并指出，西哲之“理”着眼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讨，其核心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中哲之“道”侧重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其核心是“天人合一”。再如，如何说明中西哲学思维的目的？作者指出，合逻辑性是西方哲学以及语言文字的总体要求，与之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对逻辑研究无浓厚兴趣，然而却以“通”即思维语言的贯通性为目的，“通”包括通变、会通、通顺、亨通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思维、语言和实践的重要范畴，作者对其作了详细论述和说明。作者还详尽讨论了诸如“家族文化与个体精神”、“关怀情愫与好奇心态”、“人情羁绊与法理公平”等广泛渗透于中西文化领域的价值趋向、民族心理、情感世界的不同观点。

这些问题，有的是作者独辟蹊径开展研究，有的是前人虽有涉及而笔者加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总体来说，全书内容给人以新颖、独到的感受，避免了中西文化比较常见的泛泛而谈。

二是，结构的系统性。全书从“实践合理性的询问”到“中西哲学理性精神的比较”，再到“中西文化比较散论”，三部分形成一个有条理有层次的整体结构。“实践合理性的询问”是全书的总纲，是作者评价中西哲学文化的基本尺度，也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第二部分“中西哲学理性精神比较”是全书的重点，是运用实践合理性对中西哲学进行分析阐述的主要部分，其内容按“存在论”、“本质论”、“思维方式”、“思维目的”等排列。第三部分侧重于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讨论比较。整体而言，“理性”、“合理性”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读后给人以层层展开、逐步深入、提纲挈领、脉络相通之感。

三是，方法的独特性。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的一大困难是，如何把握中西文化的主流和本质？显然，无论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还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都是内容复杂庞大且不断演变的整体，哪些是主流或主要的东西，哪些是支流或次要的东西？并不容易弄清楚。本书作者以“理性”“合理性”作为比较的楔入点，即要求从中西文化包含的“理性精神”作为全书讨论的重点，从而将宗教、非理性问题等与讨论主题无关的内容置于次要地位。其次，中西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古希腊时期表现为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而中国古代哲学，又以先秦的儒道两家的哲学理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因而，作者所谓理性精神比较主要围绕儒道两家哲学与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而展开，同时又旁及中西哲学文化的整体状况和历史发展，这样，把重点与非重点、主流与非主流既区别开来，又恰当地联系起来，避免了一般哲

学和文化比较的零散、杂乱、无序。这种方法从本质上说合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精神。

四是，观点的平允性。近代一些中国学者由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特殊处境而产生对中西文化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偏激态度是自然而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说，时局不允你不偏激，因此，过分地指责前人偏激反而有失于公允。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需要我们客观、平和、公允地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本书作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尽可能平允地评价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价值，着重于“是什么”“为什么”的研究探讨，避免简单粗暴的“好”或“坏”，“理性”或“非理性”的价值断定。例如，“有”与“无”的问题。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是从巴门尼德的“有”（存在）开始的。巴门尼德肯定了“有”，排斥或否定了“无”，无不可能存在。以“有”为提问起点，才有了关于事物“本身”“本体”“实体”的讨论，从而引出了定义和概念，可见，有作为第一性存在是理性主义的出发点。中国古代哲学关于“易”的观点与西哲以“有”为起点的思想明显不同。易即变，是由有而无，由无而有，是有无的统一。从西哲的理性观念来看，以“有无统一”的“易”作为哲学的起点是“非理性”的。因为，有无统一，有无相生，也就不可能有“本体”或“实体”的范畴设定，也无法形成概念。笔者却认为，如果由此断言中国古代哲学是“非理性”，那就流于片面或浅陋了。其根由在于，中国古代哲学是以“生命”为其根本认识对象，生命即生生死死，有无相续。中国古代哲学将宇宙、天地、社会、人生都看成生命形态的存在。以生命形态而言，“易”的观念设定恰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也是合乎真理性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的特色正

在于对生命存在和意义的深刻领悟。只有这样分析评价，才合乎中西哲学的实际状况，也比较平允。又如，作者肯定了西方文化追求新奇、探索自然奥秘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了不断追求、逐外，却不注意固守“人本身”，注重人的内在价值，势必陷入黑格尔所言的“恶的无限性”。作者这些观点发人深省。

总之，本书无论从内容，方法、观点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在中西哲学文化比较领域中有所突破和进展，全书观点鲜明，论证严密，文字表达通俗明畅，是值得一读的好书，故喜而为之序。

潘富恩于复旦大学

1999年4月

自序

询问，是人生存的基本态。人类的生存实践不可没有询问，人的活动包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在询问中不断开辟道路的。本书以“合理性的询问”为题，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深入究问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性——实践合理性的内容、本质和结构，并以此为尺度系统分析评价比较中西哲学的理性精神。询问亦表明了作者的基本旨趣，即着重于问题本身的观照、研究、考察、分析、探讨，而并不在于给人提供某种理论结论，加于人某种思想观点，一切应由读者于阅读中自己思考评判为上。

理性（rational/reason），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精神或人的一种固有力量，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人们关注理性，同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圣经》里关于人类祖先偷吃“智慧之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在笔者看来，正反映或隐喻了人类生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脱离动物（猿）的生存状态，进入“人之为人”的生存状态，所仰赖的正是人的理性（“智慧之果”）。当然也必需承认，人的理性是从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而且，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有赖于人的理性水平和理性能力的提高。如此，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探索“道理”、关注“理性”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所谓“理”或“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对客观世界而言，是要寻求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根据，形成“原理”；对人或主体而言，即是给予事物以“形式”的能力，是灵魂的

思维状态。因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侧重于人的认识或思维，可称之为“认知理性”。同时，“理性”也可以是人和世界的存在状态，是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高级完美状态的向往追求，或是世界的存在和人的生存的理想，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乃师柏拉图提出的“理念”。理念即合乎理想的存在，理念世界不同于感性世界，它是永恒的、真实的、不变的。理念世界的最高主宰是“善”，善即是神。由此，柏拉图试图将“理”（真理）、“善”（价值）、“神”（宗教）在理念世界中统一起来，从而赋予理性以世界存在本体和人的生存本体的意义。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可称之为“生存理性”或“整体理性”，即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理性”。由此看来，西方文化有两大理性传统：一是以柏拉图首倡的、康德承继其后的主张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人的生存理想相互统一的整体理性观；二是由亚里士多德肇始的强调“理性”的认知、思维功能的工具主义理性观，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现代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都这样那样地与工具主义理性观相关联。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工具主义理性观在西方文化中愈来愈上升为主导的强势的地位。

中华民族无疑是有高度理性的民族。“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观念，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道家固然言“道”，儒家也讲“道”，佛教则称之为“佛道”。道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涵着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思维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和超越的信仰关系等。“道理”是对存在世界内在规律性的认识；“道器”是对事物本体与功能、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哲学概括：道既是世界的本体或本质，也是人的价值理想和最高信念；“道德”是人对道的体认而有得于心并转化为人的内在准则和行为方式，以至转变为人的生存状态；“天下有道”指社会合乎“道”的生存理想。道

作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观念是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是人和社会从现实向理想的生成过程。如果说，西方文化侧重于工具理性，那么，中国人的“道”更倾向于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众所周知，康德的“纯粹理性”给上帝保留了地盘，中国人关于“道”的设定中，却保留了较多的神秘性或神圣性因素，无论在儒家或道家之“道”中，作为“天人合一”的道并不仅仅局限于“理性”的视野，而是要达到平凡向神圣、现实向理想的升扬，以至升华到真善美合一的超越性的人生精神境界。由此而言，中国古代道的理性精神具有较多的生存本体或人类学意义，而较少功利性或工具性色彩。

众所周知，与古代世界强调理性的本体论和人类学意义不同，近代以降，“理性”日益凸现出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意义和工具操作意义，理性越来越趋于工具化了。工具理性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生产方式的固有本质，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紧张的根源。理性仅仅成为获取功利、金钱的手段，丧失了内在的生存本体意义。并由此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质化，人的单一性、片面性，从而构成了对“人之为人”的严重挑战和威胁。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理想，摆脱人的片面化工具化的生存状态，应该恢复“理性”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赖以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素等哲学人类学的本始意义。“大道”、“理念”固然是中西文化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然而为了克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的生存偏狭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危机，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融真理论、价值论、实践论为一体的“实践合理性”概念。作为哲学人类学意义的实践合理性范畴，指的是人们运用普遍有效性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手段，去追求合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更加理想完美的总体性目标的实

践过程观念的反映，是人的实践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我们认为，应该将“理性”与“合理性”适当地区别开来。理性，一般指的是人类在认知、思维、理论方面的合规律性，合理性既指认识与思维的合规律性，也是指人类生存、实践的合目的性，是二者有机的辩证统一。合理性包括理论的合理性、操作的合理性和实践目标的合理性，三者的统一和最高形态则是“实践合理性”。

显然，实践合理性既继承了传统理性的精华，又克服了传统理性的唯心论倾向。从人类理性的发展来看，一切传统哲学包括西方近代哲学的现实基础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二分对立状态，自然是物质、存在，理性是精神、思维；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在与自然的反复较量中逐渐上升为自然世界的主导力量，人类作为自然的主人，其实践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的生存状态，也严重地影响改变着自然界；理性不再是纯粹的精神、思维和知识，而是与人的实践高度整合的工具、手段、动机、目的，理性作为人的实践及其生存状态的自我反思，理性必须转变为“合理性”，而合理性的最高形态则是“实践合理性”。只有实践合理性才能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整合统一起来，将理性内含的认识思维功能、工具操作功能、人对理想状态的向往努力、和“人之为人”的人类学目的完美地融洽起来，从而构成人类向新世纪进军的强大合力。

作者作为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有一种不自量力的企图或冲动：即企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西方哲学（主要指西方传统哲学包括近代哲学）作统一的思考和理解。虽然，这三种哲学之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差别，但笔者认为，从哲学人类学——即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观照三种认识客体，无疑包

含内在统一性的方面。本书正是集中从理性和合理性的角度，力图将三类不同认识对象贯穿统一起来。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研究探讨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将实践作为人的认识的基础，实现了哲学从传统理性向实践（理性）的伟大变革，也为认识、价值、实践相互统一的“实践合理性”命题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实践合理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理论生长点。

实践合理性是一个包括理论普遍性、操作有效性和总体目的性在内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系统结构。其中，理论普遍性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性的把握，反映了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合逻辑性的内在要求；操作有效性指的是理论转变为实践的各种各类工具、工艺、规范、制度所达到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的尺度；总体目的性指环境合目的性、社会合目的性和人自身的合目的性的互相制约和辩证统一。实践合理性内部始终贯穿着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只有在人类对自身实践及其结果的不反思中才能得到逐步解决。

我们认为，实践合理性是人类走向新世纪的理性选择，也是人类的文化理想，是衡量评判中西哲学文化的基本尺度。在第二编中，作者从实践合理性的视角，对中西哲学的理性精神从存在论、本质论、思维方式、思维目的进行系统的观照、分析、思考和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是一种庞大驳杂的整体系统。为了抓住实质和说明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中国先秦儒道学说和古希腊哲学这两个源头和主流展开分析比较，也顾及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演变。对中西哲学理性精神的比较，既是复杂的，也是饶有兴味的。例如，有与无，这是中西哲学存在论比较的重要问题。古希腊哲学的

理性精神，是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开始的，存在即“有”，“无”是不存在的；而中国古代哲学理性则是从“易”开始的，易即变易，变易是即有即无，有无相生，有无统一。“存在”与空间性的宏观物体密切相关，“存在”作为哲学范畴是对古希腊时期发达的天文学、几何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抽象概括；“变易”、或“生生之谓易”，显然与生命现象密切相关，“易”或“变易”是对宇宙天地人类的生生不息、有无相续的基本事实的哲学抽象。“存在”与“变易”虽然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固有的客观事实，是合乎“理性”的。又如，中西哲学都有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但两种辩证法讨论的目的和侧重点则各有区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法”，其目的是为了从众多的相关性事物现象中达到对其共同性本质的认识，形成概念定义，其中包含着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分析与综合等思维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因此可以称之为概念辩证法或思维辩证法。而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却侧重于主体价值的实现，强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物与我的相互作用和因应变化，最终通向主体实践的成功。辩证法的把握与运用渗透着明显的价值倾向和主体目的，如道家的“阴柔”辩证法，《易传》的“阳刚”辩证法，孔孟子思的“中庸”辩证法。从总体而言，则可以称之为“实践辩证法”，从而与古希腊哲学辩证法明显不同。我们是通过中西哲学同一命题的不同内涵，或不同命题的相近内涵来揭示中西哲学理性精神的同一与差别。

在第三部分，我们以实践合理性为基本尺度对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中西民族的行为方式作了分析比较。其中有些问题是前人已经涉及到的，有过一些零散的论述，例如“家族文化与个体精神”“关怀情愫与好奇心态”等，但作者对问题本身作了系统的开掘、疏理和分析；有的问题则是前人尚未涉及到

的，有较强的探索性质，如“出世与入世”、“克己与忏悔”、“平安与快乐”等。中国人习惯于信奉“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好人一生平安”的整体价值或幸福，和平、平常、安定、安全是中国老百姓普遍的价值倾向或选择；而西方人从伊壁鸠鲁开始，强调“快乐”尤其是感性的快乐即幸福，“快乐”成为学者们上千年深入探究的重大课题，可见，“快乐”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在欧西民族中具有极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平安”与“快乐”所包涵的不同价值选择内容，正是中西民族性格迥异的一个重要侧面。“中西文化比较六题”，虽然各个问题间并无统属关系，但却集中围绕中西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人生态度展开讨论，读后可以给人一种有机感和整体感。“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十议”，旨在说明和分疏古代传统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化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我们珍惜的内容，虽属一家之言，也在此奉献给读者。

本书从开始构思、搜集材料至写作成文，花了三年多时间，如果从本人从事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的开端言，则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迄今算来更有十四、五个春秋了。因而，笔者深知要把一些问题搞得比较清楚，没有持久的韧性努力是不行的，好在自己是一个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较大兴趣，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多年来，我一方面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及相关资料，又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另方面也从事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更加上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前景命运的关心思考，才有写作此书的主观动机和知识基础，如果读者能从阅读本书中有所助益，或从某些篇章文字中产生共鸣，那真是笔者的莫大欣慰和幸福了。

作者 1999 年 4 月于宁波大学

目 录

序.....	1
自序	1
第一编 实践合理性的询问	
第一章 实践合理性的价值课题.....	3
第一节 从传统理性到实践合理性.....	4
第二节 实践合理性的精神.....	9
第三节 实践合理性的价值课题.....	13
一 问题的由来.....	13
二 自然价值与人为价值.....	15
三 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	21
四 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	28
第二章 实践合理性的系统结构.....	35
第一节 关于普遍有效性.....	36
一 理论普遍性.....	36
二 操作有效性.....	40
三 人的普遍性.....	43
第二节 关于总体目的性.....	45
一 目的性和总体性.....	46
二 环境合目的性.....	48
三 社会合目的性.....	49

四 人的合目的性·····	51
五 自然尺度与人的尺度·····	53
第三节 关于普遍有效性与总体目的性的统一·····	55

第二编 中西哲学理性精神比较

第三章 有与无：中西哲学存在论比较·····	65
第一节 中西哲学比较概说·····	65
第二节 有与无·····	70
一 古希腊哲学关于存在与非存在范畴的 主要观点·····	70
二 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无”范畴及 其主要观点·····	78
三 结论·····	85
第三节 动与静·····	86
一 古希腊哲学的动静范畴·····	87
二 中国古代哲学的动静观念·····	94
三 结论·····	101
第四节 必然、偶然与自然·····	103
一 古希腊哲学关于必然、偶然和 自然的观点·····	104
二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必然、偶然和 自然的主要观点·····	112
三 结论·····	123
第五节 有机性与机械性·····	126
一 古希腊哲学的机械性观点·····	127
二 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机论思想·····	132
三 结论·····	135